

香港 1949： 新中國與海外華僑的樞紐

● 黃紹倫

194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關鍵的一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創業年」：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黨得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香港來說，這是「續命年」：大陸那邊山河一片紅，香港竟然不變色，依舊受英國殖民管治，彌敦道沒有改名解放路，五星紅旗亦不見在尖沙咀火車站上飄揚。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批海外華人回國，回歸大潮中人數最多的是東南亞華僑。東南亞華僑回歸中國，開始於1950年代初期，結束於60年代中期，持續十餘年，經歷三個高峰。首個高峰出現在50年代初期：「在這一時期，回國的華僑以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為主。他們主要是受到『新中國』成立的鼓舞，在民族主義思想驅使下，希望投身祖國的建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到1958年為止，有大約二十五萬華僑回國，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歸僑學生。」^①東南亞華僑

回國熱潮當中，又以印尼歸僑佔大多數：「當時回去的不是一二萬人，是幾十萬人一下就走啊。這些回去的人基本都是學生，有初中畢業，有高中畢業，還有具技術才幹的人。」^②印尼歸僑都是先乘船到達香港，經過深圳，然後回到中國大陸。其中一位歸僑回憶路過香港的經歷^③：

當時回國的華僑都是從香港的尖沙咀上岸，火車站就在尖沙咀。船在維多利亞港停着，不能靠岸。我們是在晚上到的，三更半夜，還有颱風呢。那天晚上，英國的警員派來巡邏艇，一直繞着那艘船轉，怕我們跑到香港來。第二天早上，像押犯人一樣，把我們從船上排着隊押下來，兩邊都有警員，直接上了火車，在火車站每個關卡都有警員看守。我印象很深，只有賣香煙、賣糖果的小孩可以進去。

* 本文初稿為「2016年第三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的主題演講稿。雙年會由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主辦，於2016年5月28至29日在吉隆坡舉行。現經鄭宏泰博士提議，把初稿稍作修改。



印尼歸僑都是先乘船到達香港，從尖沙咀上岸。(圖片由鄭寶鴻提供)

火車一直開到羅湖，都下車，過那個羅湖橋，看到解放軍，大家都很激動。

另一位歸僑說到回國的情景時，仍然感慨萬千：「到了香港新界，要過羅湖橋，就是一個木橋啊。對面是解放軍，這邊是英國兵；對面是五星紅旗，這邊是英國米字旗。對面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我們走過去，那邊敲鑼打鼓地歡迎，多激動啊！那種激情，還像是昨天的事情。」^④這些歸僑得以順利回國，就是因為香港沒有變色，形成一個中立地帶，開闢出安全通道。香港為甚麼不變色呢？

一 沒有解放

1949年7月，中共大軍南下，廣東解放在即。葉劍英指揮南方大軍，曾生是兩廣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向曾生傳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令：「解放軍不能越過樟木頭一線，避免引起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⑤解放軍野

戰部隊推進到深圳附近就停下來，擔任羅湖橋駐守部隊政治工作的祁峰，「曾多次向戰士們宣講中央文件，幫助戰士們提高政策觀念」；駐守羅湖橋的解放軍對按兵不動這一決策「很想不通」，自然有他們的道理：「清朝無能，和英國簽訂賣國條約，把香港租讓給英國，現在新中國成立了，我們為甚麼不恢復行使主權呢？」^⑥像他們一樣想不通的人，也不在少數。早在1940年，香港中共地下黨中便有人提出「收復香港」的口號。負責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得知後給地下黨發出指示，明確指出香港地方工作應貫徹執行「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嚴厲批評「收復香港」的口號是「狂妄有害的口號」，違背了中央的政治方針^⑦。

「收復香港」這一口號不只是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想法，它亦是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在日本軍隊入侵香港之後，蔣介石便指示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展開外交攻勢，希望迫使英國答應歸還香港。這項維護國家主權、反對殖民主義的攻勢，得到美國

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和美國民意的大力支持。英國政府採取拖延策略，含糊其詞，不作承諾。當日本戰敗投降，英國迅速行事，派遣海軍艦隊進駐香港，捷足先登，奪回香港管治權。蔣介石忿忿不平，但羅斯福已逝，美國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支持大減，國民黨唯有推遲計劃。在收回香港一事上，國民黨有心無力，終於無果而還^⑧。

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不只是美國，就連中共的「老大哥」蘇聯也有同樣看法。在1946年，蘇聯《真理報》(Pravda) 發表文章，指出無論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的中國人民，都希望香港回歸中國，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向外界宣揚它的歷史權利和取回香港主權的立場^⑨。到了1949年2月解放前夕，蘇聯派出政治局委員米高揚 (Anastas I. Mikoyan) 代表斯大林，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毛澤東舉行會談。在討論新中國政策時，米高揚亦有談到收回香港的問題^⑩。毛澤東在當年12月造訪莫斯科，和斯大林會談時，斯大林提出只要在廣東和香港之間挑起矛盾，製造緊張，便可以順勢介入，一舉把香港收回^⑪。

面對黨內外對處理香港問題的不同意見，周恩來早已委託廖承志，向熟悉香港情況的黨內同志尋求解決方案。廖承志和他的老拍檔潘漢年看法一致：「美國執行杜勒斯 [John F. Dulles] 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

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⑫廖承志和潘漢年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於1938年由中共中央指派前往香港，共同建立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以了解香港事務。周恩來採納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建議，並取得毛澤東同意。達成這項決策後，中共中央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提出三項條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只要港英政府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保持現狀；「對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並和北京方面約定，對此秘而不宣」^⑬。從此之後，周恩來便委託廖承志全面掌握情況，具體負責處理香港問題^⑭。

廖承志出身於華僑家庭，是革命烈士後人，在香港有廣泛人脈關係。父親廖仲愷生於美國舊金山，祖籍廣東歸善縣，曾協助孫中山建立中國同盟會，在1925年遇刺身亡。母親何香凝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南海縣，她父親何炳桓在香港經營茶葉和地產致富。由於這異於尋常的家庭背景，廖承志在中共黨內便顯得成份複雜，與眾不同。解放後，他曾經在廣東省黨員幹部大會上，反駁對其「海外關係」的批評：「我向你們交代，我在香港有多少親戚呢？如把我們表姐妹、表兄弟、表姑丈、表姨丈通通算在一起，恐怕有四百多個。這就是我的『海外關係』。」^⑮他為人風趣，言語生動，直接敢言。他負責處理香港事務後，在1960年代對香港新華社官員談到香港的作用時，便着力重申：「你們在香港工作，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⑯

二 爭取僑匯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亦不只是拋頭顱、灑熱血而已。革命需要軍備糧草，也要通訊醫療，在在都需要錢。革命打江山，錢從何來？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遣派廖承志到香港籌建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廖承志的主要任務，便是設法在龐大的華僑匯款中讓中共分一杯羹。

在上世紀30年代，海外華僑大概有一千萬人，他們經常匯款回到家鄉，供養家人或用作投資。這些僑匯總數達到每年國幣3億至4億元之間，差不多可以抵消中國當時的外貿逆差^①。抗日戰爭爆發後，華僑更紛紛捐款救國，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間，華僑救國捐款達到國幣2億2,000萬元^②。其中美國華僑的捐款在抗戰前四年每月平均國幣2,000萬元，「承擔了當時全部抗戰軍費三分之一左右，是支持中國長期抗戰的重要財源」^③。這些僑匯和救國捐款大部分通過香港，送回國內，所以香港是華僑資金的集散地。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香港設有多個機構，接收僑匯捐款，「統籌統匯」，運回內地，由國民政府控制使用。但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被迫聯同共產黨一致抗日，周恩來得以進駐重慶，能夠和外國使節接觸。周恩來和當時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 Kerr）爵士見面時提出，「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贏得我國海外廣大華僑的欽佩，紛紛捐助物資、藥品和款項，因此，我們需要在港設立辦事處接收。請轉告港督加以關照」^④。於是便有廖承志的任命。

廖承志抵港後，以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副軍長項英名義，在《大公報》刊登啟事，通知各地僑胞，凡是捐贈給八路軍及新四軍的款項和物資，一律由「敵軍駐港粵代表廖承志收轉」。他同時取得表兄弟鄧文田和鄧文釗的支持，鄧氏兄弟當時是香港華比銀行買辦，他們以鄧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名義，幫助廖承志接收海外華僑的捐款。在這時候，由陳嘉庚在新加坡發起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響應廖承志的號召，在香港成立救濟指揮部，籌集了上百萬港元救濟款項。廖承志在1938年6月亦協助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保盟成立一年後，從各地為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募集了25萬港元捐款，還有大批藥品和醫療器材^⑤。自此，廖承志為中共在香港打破國民黨對僑匯的壟斷，開創了「分籌分匯」的局面。

中共於抗戰時期在香港取得的，不單是僑匯捐款的實質金錢援助，它還成功接上維繫僑匯流通的金融運輸渠道。自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大批華南居民出洋謀生，香港便是他們「過番」的主要跳板，亦是他們借貸出洋，然後匯款回鄉的金融中心。於是一套層層相扣、無遠弗屆的匯兌渠道，便以香港為主要基地建立起來。這一僑兌體系的最上層是大型外資銀行，包括滙豐和渣打銀行等機構，接着是華資錢莊和銀號。錢莊以下有進行出入口貿易的商號，包括金山莊、南北行等店鋪。這些店鋪僱用眾多行商和水客，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僑聚居地，形成廣闊的金融商貿網絡。這一龐大網絡建基於血緣和地緣的信任基礎上，化整為零，在高層和

國際金融機構接軌，彈性及韌力非凡，一般不受官方控制。國民黨政府曾經嘗試把這一僑匯網絡納入國營銀行和郵政體系之內，但並不成功。日本政府和日資銀行亦極為關注這個「華僑獻金」網絡的運作，大力蒐集資料，加以研究²²。

廖承志在香港成立八路軍辦事處，透過鄧文田和鄧文釗的買辦關係，在僑匯網絡高層打通了和香港華比銀行的往來。中共中央同時委派楊琳在香港開辦一間貿易公司聯和行（後來改名聯和進出口公司），負責辦理倉儲和運輸業務。楊琳原名秦邦禮，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秦邦憲（博古）的胞弟。八路軍辦事處籌募得來的款項和物資，部分交由聯和行保管和運送到延安。楊琳後來在自傳中記述：「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配合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進行募捐工作和轉運海外華僑的捐款捐物；在華僑中做統一戰線的工作；為八路軍、新四軍採購西藥、無線電器材等；還經常回重慶、西安、武漢，把各辦事處得到的外幣捐款隨身帶回香港，兌換成國幣匯回國內。」楊琳以聯和行名義，打入僑匯網絡的中下層，經常往返香港和內地，「有時以闊商身份出現，乘坐飛機；有時也裝扮成小商小販，擠火車、汽車」²³。

僑匯網絡以化整為零方式運作，不受官方控制，隱蔽性很高，在戰亂時期展示出驚人的生命力。中共幾次在香港展開的大逃亡和大轉移，都是依靠這一網絡，得以化險為夷。1940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周恩來急電廖承志，指示要把當時聚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及文化精英搶救出來²⁴。廖承志找有「梅州大俠」之稱的廖安

祥幫忙，成功完成「秘密大營救」任務。廖安祥在香港的義順源南洋辦莊工作十多年，在1938年日軍佔領廣州後開設東利運輸公司，擁有大駁船和小艇船隊。義順源和東利公司在華南各地都有聯號和辦事處，得以順利設立「海上交通站」，把八百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偷運出港，轉移到南方各地。廖安祥又受廖承志所託，往惠州開辦源吉行，資本由中共供給。源吉行做的是批發生意，也為港商代賣貨物，收取佣金，利潤豐厚；賺到的錢交給東江游擊總部，一年大約有國幣100萬元，「源吉行一方面做了掩護文化人來往的工作，一方面在經濟上支援了抗日游擊戰爭」²⁵。

中共在抗戰前經歷幾次國民黨大圍剿，差點面臨沒頂之災，後來在八年抗戰中，飽嚙封鎖補給之苦，所以對建立地下通道、開闢生命線的工作非常重視。「秘密大營救」的成功，令中共高層對香港的僑匯網絡另眼相看。1947年，中共解放東北。東北生產大量糧食，但缺乏工業設備和生產原料。負責東北財經工作的陳雲跟駐港的楊琳是老朋友，陳雲於是委託楊琳打通大連到香港的海上貿易通道，依靠租用蘇聯貨船，經過朝鮮西北部的羅津港，直達香港。貨船裝上東北盛產的大豆和豬鬃毛等土產，抵港後由聯和公司銷售，賣貨得來的資金，用來收購東北所需物資：「藥品、真空管、卷筒新聞紙、造紙濾網，還有恢復生產需要的棉紗、鐵釘、汽車零件、紡織機械、油漆等用品」，由蘇聯貨船回程運返東北²⁶。聯和公司透過銷售東北糧食，門庭若市，在1948年改名為華潤公司。據華潤前董事長宋林的說法，「從三大戰役、渡江作戰直至解放廣州、海南，解放

軍打到哪裏，華潤採購的物資就送到哪裏。如果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百萬支前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小車裏裝的許多軍需物資則是華潤提供的」²⁷。

香港是解放戰爭的重要補給渠道和後勤基地，在解放前長駐香港的中共要員，包括廖承志和潘漢年，對這一情況深有體會。衡量利害之後，他們認為暫時不收回香港主權，比即時收回有利²⁸。中共中央採納「暫不收回」建議，並密告英方。英方迅速回應，投桃報李，在1950年1月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方的承認使中共有合法理據，進一步策動國民黨政府在香港的二十五家經濟機構「起義」投向中共，總資產約215億港元，其中包括中國銀行²⁹。周恩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身份簽發命令，接收中國銀行各海外機構，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率先響應³⁰。中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是吸納華僑匯款的渠道，雖然實力不及滙豐等外資銀行，但仍然是中共維持僑匯流通的重要金融機構。中共這時亦積極籌建新金融渠道，以防西方的經濟封鎖，這一任務主要落在方方和莊世平身上。

方方原名方思瓊，廣東普寧縣人，1920年代加入共產黨。抗戰期間和妻子蘇惠在東南亞華僑社區活動。國共內戰期間，被任命為中共香港分局書記。莊世平亦是廣東普寧縣人，蘇惠是他的姑母輩，所以他和方方有鄉誼兼親誼關係。莊世平祖父在潮州家鄉創辦協裕集團，成為普寧縣的富戶。協裕在泰國曼谷及馬來亞檳城設有批館，專為海外華僑及國內眷屬傳遞書信及匯款，在汕頭亦設有銀莊。莊世平自小浸淫於僑匯活動之中，長

大後和方方及蘇惠一樣熱衷於共產革命，抗戰期間曾在曼谷及東南亞各地任中學教師和記者，亦有經營僑匯兌換等貿易。1947年，他往返於曼谷和香港之間，和方方及蘇惠再次見面，並接受方方在政治上的領導。方方在香港把中共南方局的經費共50萬港元交給莊世平，讓他在市場上生息生利。莊世平透過自己成立的安達公司，買入棉紗運往泰國出售，獲得可觀利潤。他同時設有寶通錢莊，主要經營僑批業務，「那些有親人在解放區的華僑，由於國民黨層層的武裝封鎖，雙方早已斷了音訊。寶通錢莊不僅經營上注重信譽，還由於有地下組織建立起來的秘密渠道，華僑的信件款項可以直接無誤地匯往國內各解放區和根據地」³¹。

解放前夕，方方向莊世平通告中共中央的決定，暫不收回香港，並告訴他西方敵對勢力已經開始針對中共，實行經濟封鎖和戰略物資禁運：「以後和華僑的聯繫，就只有香港和澳門這兩條通道了。澳門的地盤太小，發展的餘地有限，主要應在香港。而我們要打破封鎖，香港也必將成為一條紐帶，一個橋頭堡。」³²為了打破封鎖，方方希望莊世平設法在香港開辦一間銀行。與此同時，華潤亦在籌備設立銀行，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948年，港英政府加強金融控制，公布《香港銀行條例》，無論任何公司，都必須取得銀行牌照，才能經營銀行業務，牌照由香港總督會同行政局簽發。華潤正式提出申請，很快獲得銀行牌照。華潤是直屬中共中央的企業，港英政府應該是知道的，牌照迅速批發，顯示中英雙方存在默契。但華潤在解放前夕忙得不可開交，設立銀行的事便擱置下來。直到

1949年秋天，當時任職於華潤的楊琳在會議上見到莊世平，莊世平正為申請銀行牌照一事煩惱，楊琳便把牌照轉給他。

南洋商業銀行於是在莊世平主持下，於1949年12月14日成立。銀行由華潤定名，「考慮到海外華僑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選定「南洋」二字^③。多年後，南商副總經理吳連烽憶述初期的業務：「當時由於本港其他銀行尚未開辦這項服務，因此經常出現客戶帶麪包排長龍辦理匯款的熱鬧景象。另外五十年代還專門設立了華僑服務部。為世界各地華僑辦理存款，並按照他們的要求，辦理贍家匯款服務。」^④世界各地華僑透過南商和香港其他金融機構，持續匯款回大陸家鄉，1949至1964年間匯款源源不絕，平均每年達到3,000萬美元左右^⑤，為中共增加一筆可觀的外匯收入。

暫不收回香港，給中共帶來的不單只是僑匯收入，還有建國初期的金融穩定。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由於僑眷眾多，因而積存大量外幣，包括港幣、美元、越南幣等。解放後，新政權統一貨幣，只容許人民幣流通，民間外幣收歸國有。葉劍英在廣東主政，制訂一個外幣出境存放的方案，由廣州方面派武裝人員把外幣送到羅湖邊境，按約定日期時間，由南商到指定地點接收款項。每次款項由初時40萬港元增加到100萬港元，運送次數亦由每星期一兩次增加到三四次。接收工作由莊世平負責，莊世平以南商名義，在滙豐銀行開設戶口，由羅湖把外幣直接運往滙豐金庫點存。為了保障運款安全，莊世平向香港警方申請，以南商在新界業務需要運送款項為理由，請求警方護衛。申

請很快得到批准，每次護衛的費用以警員多寡計算，每人每次15港元，「僅半年多，五億多港幣以及美元、越幣等一批外幣順利進入香港」^⑥。存放在滙豐銀行的外幣，名義上是南商的資產，實際上是中共南方局的外幣儲備。

同時，中共中央在1948年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人民幣。人民幣初期的印製，交由東北解放區負責，陳雲於是委託香港華潤代購印鈔紙。隨着全國各地陸續解放，人民幣需求驚人。12月，周恩來致電陳雲：「為滿足關內各地對人民銀行新幣的迫切需求，商定由東北加印人民銀行新幣五百億元。」印製新幣的紙張，主要依靠香港華潤進口，其中一部分透過海外華僑於東南亞購置：「那些日子裏，華潤採購了大量印鈔紙，香港市場上的紙都被華潤買光了，一時間『洛陽紙貴』，現貨不夠，就買期貨……華潤還通過海外華僑在東南亞購買，也通過英國洋行公司從英國、美國進口。」^⑦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新中國實施封鎖禁運。在禁運剛開始時，華潤在香港制訂了一個搶購物資計劃，目的是把華潤的外幣存款在香港本地和東南亞全部用掉：「華潤派出幾個採購小組，在香港買新聞紙，自行車，香煙紙，手錶，藥品；香港市場上可用的商品幾乎都被華潤買光了。他們還派人去東南亞國家，買橡膠，輪胎，化工原料；把東南亞市場上的此類現貨也幾乎買光了。」^⑧韓戰過後，華潤繼續為新中國的進出口作出貢獻，成為中國大陸在海外的最大外匯來源窗口：「華潤的進出口貿易額從1950年的5,000萬美元，增至1986年頂峰期的35.6億美元，在

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一度佔30%的份額。」^⑳

三 引進人才

香港既是新中國接收僑匯及賺取外幣儲備的主要渠道，同時也是為中共輸送海外人才的紐帶。在1950至1962年間，大約有五十萬華僑回到中國大陸^㉑，他們主要以香港為回國的跳板。東南亞華僑返國的情況，已如前述。這些歸僑當中，不少是科技人才，為新中國初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前夕，中共求才若渴。1946年，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開辦達德學院。港英政府對這一學院嚴密監視，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向英國的報告中說：「本港教育司有充分理由懷疑達德學院是由一批左派教授成立，目的是進行極左性質的共產黨政治訓練和宣傳。」^㉒1949年2月，葛量洪下令取消達德學院註冊，封閉學院。當時在港的作家葉聖陶，在日記裏推測港英政府封閉達德學院的原因與避免華僑學生回東南亞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有關：「其故在校中多收華僑，青年彼輩來自東南亞，將來回去勢將影響東南亞之政治，與英人有直接衝突矣。」^㉓中共南方局知道消息後，專門召開會議，討論善後工作。會議決定：「學院大多數教授北上，部分教授留港繼續工作，立即籌辦『建中專科夜校』，其他人進入內地各解放區；一部分學生(大多數是經濟系學生)留港轉入建中專科學校繼續學習財政銀行專業，為華南解放儲備財經幹部；一部分學生輸送北上由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安排；另

一部分學生則回到華南各地游擊區工作。」^㉔

新中國急需行政幹部，但更需要科技人才，而尖端科技專家大多散佈於海外學府和研究機構。為了吸引海外華裔科學家及留學生回國，中共高層費盡心思，精心安排統戰攻勢，以香港為重要據點，吸納海外專才。中共在科技方面求才若渴，動力源於國防需要。1954年12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2月台海局勢緊張，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到台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時，美國政府可以動用原子彈。據說當時毛澤東詢問周恩來，在原子彈和導彈研製方面，中方的人才怎樣。周恩來列舉已回國的錢三強、楊承宗和彭桓武，然後特別提及「另一位在美國『火箭之父』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博士門下工作過的導彈專家錢學森教授」，並說「我們正在通過各種途徑，爭取他早日歸國」^㉕。

早在解放之前，周恩來便設計了多種統戰渠道，爭取錢學森和其他海外知識份子回國。1948年，中國留美學生創辦「留美科技人員協會」，該會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負責人是羅沛霖。羅沛霖出身於天津望族，1935年在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後不久奔赴延安。1947年，錢學森回上海探親。羅沛霖那時在天津從事地下工作，中共黨組織指示他前往美國唸博士，並提供500美元經費。羅沛霖於是往上海拜會錢學森，並得到錢學森的推薦，往加州理工學院唸博士。羅沛霖到達之後，和錢學森的學生租住同一套房子，並成為錢家中的常客^㉖。

1949年5月，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副教授葛庭燧給錢學森寫信，動員錢學森回國，信中附了香港

大學心理學教師曹日昌的函件，向錢學森轉達「北方當局」（即當時已控制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的中共）的召喚。曹日昌畢業於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後赴英國劍橋大學唸博士，在英期間加入中共。他在1948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後，受聘於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到港後在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兼職，爭取海外留學生和學者回國^{④6}。曹日昌的信這樣說^{④7}：

學森先生：

聽好幾位留美的同學提到您，可惜我們沒有見過面。

近來國內的情形想你〔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國解放在即，東北華北早已安定下來了，正在積極地恢復建立各種工業，航空工業也在着手。北方工業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訊不便，不能寫信問候，特命我代為致意。若果您在美國的工作能以〔夠〕離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國內來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尊意為何，盼賜一函。一切旅程交通問題，我都可盡力襄助解決。

最後我作一個自我介紹，我是學心理學的，現在香港大學任教。因為香港接近國外，國外朋友回國的多數經過香港，我就順便地招呼一下。

餘另敘，候示，即祝

研安

弟 曹日昌上 五，十四

葛庭燧在1949年5月20日致錢學森的信中，附上曹日昌的函件，重申曹日昌是國內外聯絡人之一，曹的函件是「遵北方當局之囑」。葛庭燧在信末表達他本人的意向：「弟雖不敏，甚願追隨吾兄之後，返國服務。弟深感個人之造詣及學術地位較之整

個民族國家之爭生存運動，實屬無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滯國外，對於國內偉大的生存鬥爭猶如隔岸觀火，輒覺淒然而自慚！」這封動員信錢學森一直保存，到了1993年葛庭燧八十歲誕辰時，錢學森在賀信中說：「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是你引導我回到祖國懷抱……」^{④8}

曹日昌和葛庭燧的動員信顯然打動了錢學森，但錢學森的回國歷程還是一波三折。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在羅沛霖協助下，買了機票準備回國，但在機場被美國官員拘留，不准離境。當時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Dan A. Kimball）致電美國司法部說：「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隊。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④9}

1954年，美、英、法、中、蘇五國外長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解決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美國透過英國代表，向中方表示希望解決在華被拘留美方人員回國的問題，於是歷時十五年、共進行了136次會談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展開。漫長的會議並沒有取得很多成果，但其中一個是中美雙方在1955年8月於日內瓦同意釋放十一名在韓戰中被俘的美國飛行員，換取錢學森回國。錢學森一家在9月從洛杉磯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香港。途中錢學森和家人在檀香山下船散步，但在日本和菲律賓就不能下船，「因為那裏不是美國的領土，美方無法保證他的安全」^{⑤0}。10月初，錢學森抵達香港，那時香港是唯一能夠直達中國大陸的安全港口。周恩來指派中國科學院和其他人員在港迎接，即日護送錢氏一家跨過羅湖橋，回到

中國大陸。歸國後，錢學森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成功組織了近程導彈飛行試驗、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試驗，以及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發射。後來周恩來談及中美大使級會談時說：「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⑤

四 輸出革命

新中國通過香港匯集資金，吸納專才，亦輸出革命。周恩來強調香港的特殊作用，曾經說：「香港是天文台、觀察站、氣象台、發射站，香港適宜發出放射性的東西。」^⑥在抗戰時期，這些「放射性的東西」包括各種有關中共奮力救國的宣傳書籍和刊物；中共亦有從香港派出地下黨員和文化精英，前往東南亞各地，號召團結抗日。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成立後，「陸續派王任叔、杜埃、陸詒、董維健、金仲華、胡一聲等人到新馬、印尼、菲律賓、美國紐約等僑居地開展華僑工作……辦事處應《南洋商報》社之邀，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推薦胡愈之到新加坡任該報編輯主任。連貫亦曾兩次代表中共華南分局派歸僑蔡白雲和鍾萍夫婦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地從事僑運工作」^⑦。八路軍辦事處同時組織毛澤東著作的發行和翻譯工作，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就是在香港翻譯成英文的，譯者張繼是一位美國華僑，曾經參加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縱隊^⑧。香港雖然受殖民管治，但出版比較自由，書刊的審查控制也不太嚴格，特別是抗戰爆發後，港英政府對中共的有關著作都假定是針對日本和鼓吹救國的宣

傳，並不阻止這類書刊運往東南亞一帶流通，香港和上海於是變成當時在海外傳播中國現代文化的中心^⑨。馬來亞共產黨領袖陳平在近年回憶他年青時信奉共產主義的心路歷程，便特別提到毛澤東著作對他的影響。當日本開始侵華，陳平在馬來亞非常關注中國局勢：「在約一兩年間，中國屢戰屢敗，半壁江山被日本侵佔。為甚麼會這樣？我要找出根由。看來蔣介石在抗戰方面領導無方……當我找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後，我的疑難盡解。我們為何戰敗，怎樣才能取勝。」除了毛澤東著作之外，陳平亦翻遍各種各類書刊，包括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有關爭取印度獨立的《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中譯本，這類讀物都是在香港和上海出版的^⑩。

前述 1949 年 2 月毛澤東和米高揚舉行會談時，也談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合行動。毛澤東說中共沒有明確意見，但贊成和東南亞各地共產黨建立聯繫，而那時中共與印度支那共產黨及朝鮮共產黨聯繫比較密切，與其他地方共產黨聯繫比較少，主要是通過香港的聯絡員聯繫^⑪。7 月，劉少奇秘密訪蘇，和斯大林會談，答應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建立密切聯繫^⑫。到了解放後，1951 年 2 月，劉少奇在給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的信中說：「同意任廖承志為中央對外聯絡部第一副部長，李初黎（梨）為第二副部長，連貫為第三副部長」，「同意對外聯絡部設立幹部學校為各兄弟黨訓練幹部。但這個學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稱，也不要正式的校長」^⑬。

早在 1948 年，中共還未取得政權時，已經開始提供資金支持越南共產黨，任務由中共華南局負責，具體

工作則由莊世平在香港展開：「莊世平不時要與一位姓陳的越共同志見面，將捐款交出去。華南局的捐款幾乎都是臨時從各方面調運的，總共幾萬元或幾十萬元的港幣就是一大堆的零鈔。為了不暴露目標，也便於攜帶，莊世平總要一家銀行過一家銀行地將零鈔換成大鈔。……六十年代莊世平參加中國銀行代表團訪問河內時，受到了超乎規格的隆重款待，原因就是他見到了那位當年與他交接捐款的越共陳同志，陳同志當時正擔任越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⑥

1949年10月，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派出兩名特使前往北京，尋求中共援助。特使之一是李班（又名李碧山），從越南走海路到香港，再經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香港工委）安排，乘輪船往青島，然後轉往北京。另一名特使是阮德瑞，他走陸路進入廣東，再前往北京和李班會合。李班帶着胡志明（姓名代號：丁）親筆致周恩來及鄧穎超的密函，信中這樣說^⑦：

恩哥、穎姐：

弟與哥姐相別十年了，時時思念，且有許多新事要告訴你們。弟謹代表敝店祝賀貴公司的偉大發展。

敝店年來生意頗好，意欲爭取時機，打勝對方，謹派親信夥計兩人，趕緊求你們幫助。

丁
十月

李班和阮德瑞經海路和陸路走了兩個多月，抵達北京，把密函交給中共中央。劉少奇代表中央派出聯絡員羅貴波入越，隨後胡志明決定親自秘密訪華。劉少奇把胡志明送往莫斯科，因為那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那裏與斯

大林會談。在莫斯科，中蘇兩黨達成援助越南協議，「蘇聯援助中國的建設，越南抗法戰爭則由中國援助」^⑧。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成軍事顧問團入越，協助越共軍隊作戰。1954年，越共在奠邊府打敗法軍，越南停戰，中國顧問團完成使命回國。「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鬥爭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各種槍支11.6萬多支（挺），火炮420門，以及大批配套的彈藥和器材等」^⑨。

越共得到中國援助，在1954年成功擊敗法國軍隊。但在同一時期，掀起反殖抗爭的馬共，命運便截然不同。陳平晚年時撰寫《我方的歷史》，他在書中說：「我在1947年訪問香港期間，透過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駐香港高級幹部，得到一系列代號和安全的郵政地址，供我黨聯繫之用。」又稱馬共事務的決策，都會經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議定，而當時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正是鄧小平^⑩。陳平率領馬共游擊隊在馬來半島和英軍血戰多年，但沒有取得成功。他後來總結經驗時說：「這顯示我們弱點之一，因為我們並沒有任何外來的援助。有些人懷疑我們從中國或其他國家得到一些幫助，其實沒有，就是一顆子彈也沒有。」^⑪和陳平對話過的西方學者李瑞（John Leary）有相同看法：「〔馬來亞〕共產黨發動一場戰爭，他們知道沒有外援是不能成事的，但他們被蘇聯、中國以及越南的朋友背棄，因為這些朋友並沒有提供任何實質幫助。他們樂於說三道四，但從未伸出實際的援手……英國在〔馬來亞〕緊急時期取得的聲望使得英國成為唯一在東南亞未被共產黨打敗的帝國勢力。」^⑫

中共在輸出革命的策略上，顯然是有主次之分。主要考慮是鞏固邊

防，所以集結兵力援助朝鮮和越共，敵人則鎖定是美國和法國。英國是拉攏對象，用意是在英美之間製造分歧。這一策略在1958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中共準備炮打金門的時候清楚表示出來。毛澤東給彭德懷作出指示，要他停止在深圳的演習：「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因此不要在廣東深圳方面進行演習了，不要去驚動英國人。」^⑥毛澤東特別重視香港在台海兩岸所能發揮的作用。1956年，他到廣州檢查香港工作，覺得很不滿意，認為對香港利用不夠，於是對香港新華社進行大改組。據當時在新華社工作的黃文放憶述，毛澤東說：「《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這兩份報章可以銷往台灣，因此要通過這兩份報章，將大陸的訊息傳達到台灣，但千萬不要改變《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這兩份報紙反共面目，要保留中華民國年號、保留反共，在最關鍵的時候傳達幾句話就夠了。」^⑦

關鍵時刻在1964年到來。中國在那年成功試爆原子彈，轟動國際。但台灣自1949年以來一直對大陸實行新聞封鎖。中共中央指示香港新華社，要設法把中國試爆原子彈消息和有關聲明送到台灣去。金堯如是香港工委新聞戰線的黨書記，他負起這項任務，找《星島日報》老總周鼎和《華僑日報》老總李志文幫忙：「當晚十時，在新華社未發出消息之前，我分別與周鼎兄和李志文兄商量中央這個意見，分別決定，周鼎兄在《星島日報》全文刊載，但標題則表示『反動』。我現在記得好像是：『中共自吹自擂爆炸原子彈』。《華僑日報》則採不同方式，用摘要，但標題則採客觀報道的態度。次日兩家報紙都進入台灣出售。到傍晚台灣當局始發覺，對《星

島日報》全文刊載特別緊張。特派員去沒收報紙，已經遲了。……此事中央對《星島日報》周鼎兄和《華僑日報》李志文兄的愛國情操大為感佩。」^⑧

五 結語：香港奇迹

香港在1949年沒有解放，可算是奇迹。這一奇迹的基礎，是香港在近百年間演變出來的華僑網絡和它的樞紐角色^⑨。中共領導人在抗戰期間對香港的特殊角色了解日深，進而善加利用，發展出獨特政策，建立了兩條廣泛的統一戰線：「一條是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一條是聯英反日，爭取中國民主的統一戰線。」^⑩負責香港政策的中共領導人眼光獨到，靈活善變，在建國初期把統戰策略推行得有聲有色，成功透過香港爭取僑匯，引進人才，輸出革命。這一統戰策略以「愛國一家」為原則，「不分階級，不分政治信仰，也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他們愛中國，愛中國同胞，愛中國錦繡山河，愛中國歷史文化，就是愛國者」^⑪，這就是廖承志所謂的「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⑫。它主要在香港和海外推行，本來問題不大，但麻煩在於香港和華南並不是完全隔離的。華南有眾多華僑眷屬，當中共在大陸推行土地改革時，華僑政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矛盾便顯露出來。「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和「工農兵愛國主義」難以相容，很多僑眷被劃成富農地主，土地房屋被沒收，僑匯被視為資產階級毒藥。僑眷的遭遇在海外華僑及香港居民間引起極大震盪，紛紛向中共領導人申訴苦況。負責華僑政策的廖承志在1950年代向中央大力爭取：「華僑的情況必須有

特殊的政策：按土地法規定，留下中農的土地數量外，其餘部分，應該分掉的就分掉；可是華僑的房屋，包括地主、富農的房屋，一律給予保留，凡是已經分掉的華僑房屋一律應該退回。」^⑭中共中央同意下達這項政策，但廣東省委不同意，就是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親自給廣東省委打電話也沒有用，未能迫使廣東省委退還已佔去的華僑房屋。直到1978年，早年在廣東被佔去的華僑房屋仍然沒有退還^⑮。而支持華僑政策的幹部事後屢屢遭到批評，大部分被迫靠邊站^⑯。

僑眷的遭遇深深傷了海外華僑的心，有能力的華僑千方百計把眷屬遷往香港。1949至1964年間，超過一百萬名僑眷移居香港。隨着僑眷離開大陸，僑匯逐漸留在香港，作為投資和贍養僑眷之用。據估計，在同時期，大約七成僑匯以香港為終點站，每年款項達到4,000萬美元左右^⑰。僑眷和僑匯之外，其他東南亞歸僑也相繼流往香港。東南亞歸僑難以融入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社會，印尼歸僑在昆明被稱為「華僑人」，「比較低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折磨^⑱。故此到1976年為止，「有大約三十萬人離開了中國，其中包括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作家、藝術家等專業人士……除了少數人以並非合法的手段回到東南亞之外，大約有二十五萬人滯留在香港」^⑲。

中共「愛國一家」的統戰策略受到社會主義建設洪流衝擊，無意間把僑眷、僑匯及歸僑都沖到香港來，使香港變成華僑的避風港和聚寶盆。香港在上世紀70、80年代，憑着這些資源振翅高飛，蛻變為亞洲的一條小龍，創造出另外一個奇迹。

註釋

①②③④⑭⑮ 王蒼柏：《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6），頁8-9；208；53-54；209；214；12。

⑤ 南兆旭編著：《深圳記憶1949-2009》（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9），頁252。

⑥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 鐵竹偉：《廖承志傳》（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344；343；344；300；176-77；181-82；343；267；269。

⑳㉑ 梁上苑：〈廖承志與香港〉，載《中共在香港》（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頁63-64；42。

㉒ 參見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孫揚：《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㉓㉔ Michael Share, *Where Empires Collided: Russian a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4; 119.

㉕㉖㉗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頁248；245-47；227。

㉘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編著：《周恩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頁104。

㉙㉚㉛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頁32；32；34。

㉜㉝ Lin Wei-Wu, "Survey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Remittances and Investments in the 1930s", in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 ed. George L. Hicks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121-22, 173; 112-215.

㉞㉟㊱ Chun-Hsi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to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7), 80; 142; 156; 143, 10.

⑲ 梁上苑：〈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建立內情〉，載《中共在香港》，頁2。

⑳㉑㉒㉓㉔㉕ 吳學先撰稿，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紅色華潤》編委會編：《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8-9；40；129；71；179；8。

㉖ 梁上苑：〈抗戰期間華僑援助抗敵組織〉，載《中共在香港》，頁82。

㉗ 梁上苑：〈「秘密大營救」來龍去脈〉，載《中共在香港》，頁89、93、96。

㉘ 〈前言〉，載《紅色華潤》，頁7。

㉙㉚㉛㉜㉝㉞㉟ 廖琪：《莊世平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4)，頁152；122、135；140；177；162；124；199、205。

㊱ 葉聖陶：《日記三抄》(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頁64。

㊲ 香港達德學院北京校友會編：《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北京：群言出版社，1992)，頁38-39。

㊳㊴㊵㊶㊷㊸ 葉永烈：《錢學森》(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頁4-5；183-85；186-87；14-15；38-40；39。

㊹ 〈曹日昌致錢學森〉(1949年5月14日)，清華校友總會網，www.tsinghua.org.cn/info/1952/16687.htm。

㊺ 〈名字寫在世界科學史上的科學家：金屬內耗研究大師葛庭燧〉(2015年2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友服務網，http://alumni.cas.cn/kyws/201502/t20150202_4307969.html。

㊻ 任貴祥、趙紅英：《華僑華人與國共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頁165-66。

㊼ 任貴祥、趙紅英：《華僑華人與國共關係》，頁165；梁上苑：〈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建立內情〉，頁40。

㊽ 參見Wang Gungwu, "Cultural Centres for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Chinese and Indian Diaspora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Wong Siu-l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27-50。

㊾㊿ C. C. Chin and Karl Hack, eds.,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5-66; 150.

① 沈志華：〈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亞洲革命領導權的轉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頁29。

② 劉少奇：〈同斯大林談推翻國民黨問題〉(1949年7月2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0-41。

③ 劉少奇：〈關於成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問題〉(1951年2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25-26。

④⑤ 錢江：《越南密戰：1950-1954中國援越戰爭紀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華廈出版社，2015)，頁8；26。

⑥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18。

⑦⑧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頁150-51；114。

⑨ C. C. Chin and Karl Hack, eds.,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239. 類似觀點亦可參見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London: Muller, 1975)。

⑩⑪⑫ 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香港：田園書屋，1998)，頁54；79；64。

⑬ 參見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⑭ 楊奇：〈廖公批四人幫「染紅」港報——一貫防「左」反「左」的廖承志〉，《文匯報》，2008年10月1日，A46版。

黃紹倫 香港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